

论海上民族对埃及的移民及其对近东世界的影响

郭丹彤

(东北师范大学 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 吉林 长春 130024)

摘要: 海上民族的移民活动是公元前 13 世纪末 12 世纪初席卷几乎整个近东地区的一次武装移民, 作为近东地区主要国家的埃及是他们入侵、掠夺以及意欲定居的最佳目标。与海上民族给近东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的灾难相比, 他们给埃及造成的灾害则是微乎其微的。海上民族的武装移民是成功的, 此后近东地区出现的许多城市都是由他们建立的, 而出现的一些新的民族则与他们或多或少地有着某种姻亲关系。

关键词: 海上民族; 移民; 埃及; 近东

中图分类号: K411.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 - 0246 (2009) 08 - 0140 - 05

公元前 13 世纪的最后 10 年是近东历史上的和平繁荣时期, 但同时也是征战频仍的动荡时期的开始。这一场近东历史上的规模最大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武装移民活动, 引发了一系列重大事件。这次移民活动的主角就是来自小亚沿海和爱琴诸岛的部族, 即埃及文献中所称的海上民族。毫不夸张地说, 海上民族的活动给埃及和近东地区其他国家造成巨大影响, 改变了古代近东世界的格局。海上民族是亚历山大征服活动之前近东世界最大一次动荡的始作俑者, 其活动标志着一个和平稳定时代的结束和一个不安时代的开始。

一、海上民族武装移民的动因

到目前为止, 我们对海上民族武装移民活动的真正原因仍无从查起, 但关于该问题的一些猜测和臆断似乎也很有道理。其中的一个观点侧重于经济上的原因, 即由于爱琴海诸岛的土地比较贫瘠, 矿产资源的储量也非常有限, 为了维持社会发展的需要, 他们不得不从近东各地进口所需纯原料。又由于该地区由来已久的海盗活动以及沙达纳人 (Shadana) 成功地在埃及定居, 极大地刺激了爱琴海地区以及其他城市的人口进行以掠夺纯原料和武装移民为目的的活动。另一个原因应该是爱琴海诸岛在这一时期遭受了自然灾害的打击, 尽管我们没有足够的证据来证明公元前 13 世纪末期爱琴海诸岛遭受了一次范围很大且持续时间很长的因农作物歉收而带来的饥荒的打击。这次大饥饉使当地的居民背井离乡, 进而铤而走险, 从事海上掠夺活动。希罗多德和迪奥多如斯都曾提到过从前的一次大饥饉迫使西姆人 (Syme)、纳克索斯人 (Naxos) 和萨底斯人 (Sardis) 移民到其他地区, 而且同一时代的埃及和乌伽里特文献资料也提到了安纳托利亚高原曾发生过范围很广的饥荒。这就充分说明了食物充足的埃及成为来自爱琴海诸岛和小亚地区饥饿的人们首攻和移民的主要目标。最后, 这一时期曾发

基金项目: 2009 年东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研究团队项目。

作者简介: 郭丹彤, 历史学博士, 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教授, 研究方向: 埃及史。

N. K Sandars, *The Sea Peoples: Warriors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1250 - 1150 BCE*, London, 1978, p. 20.

M. C. A. Stour, "New Evidence on the Last Days of Ugarit",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1965 (69), p. 255.

生一次流传甚广的瘟疫在爱琴海诸岛，似乎也可以作为导致海上民族移民活动的一个原因。

事实上，希腊本岛也出现了武装移民活动的倾向。大约在公元前 1300年，一个游牧部落从西撒利移民到埃皮如斯，后来这个游牧部落与多里亚人结成了联盟。半个世纪后他们再一次向南迁徙，所经之地处处留下他们抢掠的痕迹。与此同时，希腊本岛也经历着一次严重的内部纷争。通过考古发掘我们发现，迈锡尼、克林斯、雅典等城市在公元前 1250年至 1240年城防突然加固的原因恰恰证实了这次移民活动的历史真实性。这些游牧部落的移民活动给整个希腊半岛的居民带来了极大的恐慌，经过大约 20年的武装移民后，到公元前 1220年，迈锡尼和派罗斯等城市的陷落标志着被称作希腊青铜晚期文化的终结。曾经辉煌一时的阿黑亚瓦帝国也遭受了致命的打击。

此外，还存在着某种政治上的主观原因，这就是青铜晚期时期近东强权体系趋于崩溃，进而导致这些强国的毁灭以及随之而来的各强国内部权力的纷争，主要表现在原有属国的反叛。一个明显的例子就是约公元前 1250至 1240年赫梯国王图德哈里亚斯四世统治时期，赫梯的 22个属国结成联盟，共同反叛赫梯的统治。虽然此次大规模的起义被镇压了下去，但赫梯帝国的西部疆域却从此走向崩溃。也正是这位赫梯国王，灭亡了曾在青铜时代晚期东地中海地区政治舞台上盛极一时的塞普鲁斯。

阿黑亚瓦的衰落以及图德哈里亚斯统治时期赫梯帝国的动荡，为处于这两个强权夹缝之间的小亚沿海各城创造了获得解放的机会。各强权之间的条约对这些城市形成不了任何约束，于是来自于这些小亚城市的部族便与来自爱琴海诸岛的部族联合起来，地中海沿岸富裕的国家和埃及作为它们进攻并移民的主要目标。

二、流向埃及的海上民族

海上民族有着非常强的战斗素质，并且还配备了当时技术最先进的武器装备，由于这些地区铁器使用得比较早，因此该地区在技术上在公元前 14和 13世纪的近东世界处于领先地位。海上民族的每一个成员都配有长剑、盾牌、头盔、甲冑等军事装备，俨然是一支战斗力很强的正规军。

作为来自埃及北方的民族或种族，如果海上民族要从海路进攻埃及，那么他们将有两条进攻路线可供选择。最明显的一条路线是沿东地中海沿岸行进，把塞浦路斯岛作为中转站；不太引人注目但却十分畅通的一条路线是经由克里特岛到达现在非洲北部的港口城市摩萨·玛图克，这里的考古发掘揭示了公元前 14世纪该地区是埃及、克里特和塞浦路斯之间贸易的中转站，同时它也是一条通往内陆的贸易路线的起点。总之，到公元前 13世纪后期埃及三角洲西部沿海地区为这些海上民族所熟识。

大约在公元前 1237年，埃及第十九王朝年迈的国王拉美西斯二世在统治埃及 67年后逝世，他的第 13个儿子美楞普塔即位。美楞普塔继承王位时已经是一个体衰的老人了，但是在他年轻的时候，他曾在埃及军队中服役了很长一段时间，所以对军事还是非常熟识的。在他统治的第二年，他从位于三角洲的首都出发前往底比斯去祭奠阿蒙神，同时清查阿蒙神庙的收支账目。就在美楞普塔享受着国内的和平环境的时候，两支反埃及的力量正在集结，并着手向埃及发起进攻。一支就是我们所熟知的利比亚人，他们对埃及的入侵和渗透是流向埃及的第一次武装移民活动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另一支就是我们在这里所要讨论的海上民族。

N. G. L. Hammond, "The Literary Tradition for the Migrations", in I. E. S. Edwards, et al, eds,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I/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684.

N. K. Sandars, *The Sea Peoples: Warriors of the Ancient Mediterranean 1250 - 1150 BCE*,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8, pp. 60 - 62.

N. G. L. Hammond, "The Literary Tradition for the Migrations", in I. E. S. Edwards, et al, eds,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I/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694.

N. K. Sandars, *The Sea Peopl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8, pp. 84 - 97.

郭丹彤：《论新王国时期埃及和利比亚的关系》，《东北师范大学学报》2003年第 5期。

当时的埃及人对海上民族原有的认识是一群凶猛的武士，他们通常采用突袭的方式对他们的目标采取进攻，因为他们使用的船只速度很快且进退自如。《荷马史诗》曾对这种突袭进行过较为细致的描绘，第十九王朝的国王拉美西斯二世和美楞普塔遭遇的海上民族对埃及的入侵也采用了这种方式，也就是说，这时的海上民族对埃及的侵略只是停留在掠夺财物的层面上，当他们达到目的后就迅速地撤离被掠夺地，那种以定居为目的的完全彻底的征服活动还没有发生过。青铜时代晚期埃及与希腊诸岛之间的贸易呈不断上升的态势，所有证据表明第二十王朝的国王拉美西斯三世统治的头八年海上民族已经定居于巴勒斯坦沿海地区。然而就在拉美西斯三世统治的第八年，海上民族突然向埃及发起了进攻。

关于这次海上民族入侵近东地区的唯一证据就是拉美西斯三世的麦底奈特·哈布铭文。该文献刻写在拉美西斯三世的位于底比斯的神庙墙壁上，它描写了拉美西斯三世统治的第八年，由七个部族组成联盟的海上民族发起了对埃及和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进攻，但却以失败而告终。该文献这样写道：“许多国家成为这些海上民族们的攻击对象，并几乎在同一时间被消灭掉；没有一个国家能够站在他们的面前，这些国家中以赫梯为开端，然后是靠德（Qode）、卡开麦什（Carchemish）、阿匝瓦（Arzawa）和阿拉什亚（Alashiya，也即塞浦路斯）。在阿姆茹境内他们建立了军营，他们杀戮这里的居民，烧毁他们的房屋，把整座城市夷为平地，犹如这座城市从来没有存在过。当他们从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撤出的时候，他们沿途烧毁所经地区，并向埃及挺进。他们的主要力量是派莱塞特（Pelset）、柴克如（Tjekru）、晒克莱什（Shekelesh）、达阿努（Da'anu）、瓦绍什（Washosh）以及其他联盟成员。他们把手伸到了他们所能及的所有地方，他们心中充满了自信：‘我们定能成功！’”

与美楞普塔关于海上民族入侵的资料不同，拉美西斯三世的关于他统治的第八年的海上民族入侵的记录，给了我们一个图画式的描述，这就为我们研究他们的来源提供了证据。无论是在浮雕中还是在文献中最具鲜明特色的当属派莱塞特人，其次是柴克如人。他们的头上都带有一支松软的羽毛，后脖颈上也带有一支具有保护性绒毛。他们的武器装备包括长剑、长矛、圆形盾牌，以及护身盔甲。现在人们发现埃及浮雕中或文献中描绘的海上民族头上的这种特有的羽毛与“凡斯托斯（Phaistos）文字”中的一个表意符号完全相同，凡斯托斯文字是公元前13世纪克里特岛上凡斯托斯地区的一种文字形式。几个古典作家认为正是小亚西南以及利西亚北部的开利亚（Caria）人首先把羽毛用在了头盔上。令人感兴趣的是在被犹太国王征募的卫队名单中这种羽毛头饰是开利亚人和克里特人民族的象征。至于名词“派莱塞特”和“柴克如”，前者可能就是皮拉斯基人（Pelasgians），一个前希腊时代的爱琴文明居民；后者使人想起了特劳德（Traod）的条顿人，以及克里特岛上的“匝克如人（Zakro）”。其他部族，如晒克莱什（Shekelesh）和泰莱什（Teresh），都用布装饰头部，并在他们的胸前佩戴奖章，随身携带两个矛和一个圆形盾牌；他们的家乡被认为是皮斯底亚（Pisidia）的撒噶拉索斯（Sagalassos）。瓦绍什似乎与开利亚沿岸的拉索斯（Lassos）岛有着密切的联系，达阿努就是荷马笔下的“达阿努人”，希腊人的统称，原意指希腊半岛东南部的阿哥斯人。

在拉美西斯三世统治的第八年的入侵中，埃及人面对的是一个海上各民族的联盟，他们是以开利亚为中心的爱奥尼亚和皮斯底亚沿岸各族的联合体，同时也包括了来自希腊本岛各族。历史文献证明了这一点，因为海上民族的船只多出现于爱琴文明的记录中。

W. F. Albright, "Syria, the Philistines, and Phoenicia", in I. E. S. Edwards, et al, eds,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I/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522.

W. F. Edgerton, and J. A. Wilson, *Historical records of Ramses III*, Chicago: Press of University of Chicago, 1936, pp. 53 - 56.

Helck, W. et al, *Lexikon Der Ägyptologie*, Band V, Wiesbaden: Otto Harrassowitz, 1984, pp. 814 - 822.

N. K. Sandars, *The Sea Peoples*, London: Thames and Hudson, 1978, pp. 88 - 95.

D. B. Redford, *Egypt, Canaan 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52.

三、海上民族的武装移民对近东世界的影响

海上民族发起进攻的时期，也即公元前 13 世纪的末期，是铁器时代的初期，也是希腊黑暗时代之前的一个时期，由于历史文献资料的缺乏，神话传说就成了唯一的资料来源。如他们被说成是来自波爱提亚的逃亡者的后裔，在特洛伊战争后的几年时间里他们从爱奥尼亚沿海地区穿越金牛山进入帕姆菲里亚（Pamphylia）和西里西亚（Cilicia），其中的一些又进一步移民到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地区。另一种神话传说也说他们是在特洛伊战争后从爱琴海地区迁徙到帕姆菲里亚，并成为叙利亚地区波塞东城（Poseidion）的建造者。第三种传说与上述两种相似，说阿扎克斯的兄弟条克在特洛伊战争结束后率众移民到塞浦路斯和西里西亚；阿卡底亚国王阿加门农也有可能是在特洛伊战争后率众移民到塞浦路斯。如果这些神话把移民活动扩展到了叙利亚，那么菲利斯丁诸城和阿什克龙（Ashkelon）很可能与来自克里特的逃亡者有着密切的联系。

由此，根据同一时代的文献资料以及后期古典作家的记述，我们可以整理出以下的史实：公元前 13 世纪末，一个意欲重新统一迈锡尼的社会运动导致了不想统一的各城结成了一个松散的联盟，共同对抗从前在反对赫梯时结成的爱奥尼亚联盟的首领特洛伊。在特洛伊陷落后的最初几年里，从前的迈锡尼远征军中的几个成员结成松散的联盟，他们携妻带子沿小亚南部海岸向东移动，并定居在西利西亚和叙利亚北部地区。这个联盟中的分支运动的范围更加广泛。大约在公元前 1200 年，他们在占领了萨底斯后，又向塞浦路斯移动。赫梯的最后一位国王舒皮鲁里乌玛斯二世试图改变这种局面：“来自塞浦路斯的敌人与我在海上交战了三次。我摧毁了他们，我把俘获的敌船烧毁在海中。”不久我们再一次获悉了类似的战事：“大批来自塞浦路斯的敌人向我发起进攻。”的确，这一时期入侵者的船只广布于塞浦路斯和叙利亚附近海域。事实上，叙利亚当地城市的国力并不弱，他们在近一个世纪的自由贸易中积累了大量的财富。仅就乌伽里特自己就可以组织起一支由 150 艘船组成的海上力量，这个规模要比希腊任何一个城市的海上力量都大。当乌伽里特陷落的时候，他们的最后一批文献还在烤炉上烘烤，这些文献告诉了我们一个不可思议的情节：当乌伽里特军队作为赫梯的盟军在金牛山与一个不知名的敌人作战的时候，海上民族的船队已经进犯到了乌伽里特沿海地区。塞浦路斯被严密地包围起来，其国王和宰相向其他国家作出了这样的忠告：“注意！20 艘敌船曾集结在这里，但是现在却撤离了，且去向不明！或许它们将驶向叙利亚沿海地区。把你的城市用防御工事封锁起来，把你的军队和车兵撤到城里。密切监视敌人动向并保存自己的实力！”尽管乌伽里特采取了严密的防守措施，但该城最终还是陷落了。乌伽里特最后的一位国王设法给塞浦路斯捎去了最后一封信：“现在敌船已经到来，他们焚烧了我的城市，并在我的国土上大肆暴行。我的父亲！难道你不知道我所有的军队都在赫梯，我所有的船只都在利西亚吗？”

事实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抵挡住这些海上民族的入侵。哈图沙被摧毁，赫梯帝国土崩瓦解，塔苏斯被夷为平地，塞浦路斯、阿拉拉赫和乌伽里特也被彻底摧毁并永远无法重建。叙利亚、巴勒斯坦地区的青铜时代晚期瞬间消失，考古资料完全印证了文献记载的准确性。

海上民族从建立在阿姆茹的营地出发向南推进，妇女和孩子坐在牛车里，战船则与海岸保持了一

D. B. Redford, *Egypt, Canaan 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53.

M. C. Astour, "New Evidence on the Last Days of Ugarit",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1965 (69), p. 256.

V. R. d' A. Desborough, "The End of Mycenaean Civilization and the Dark Age", in I. E. S. Edwards, et al, eds,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I/2,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75, pp. 659 - 62.

D. B. Redford, *Egypt, Canaan and Israel in Ancient Times*,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2, p. 254.

M. C. Astour, "New Evidence on the Last Days of Ugarit", *American Journal of Archaeology*, 1965 (69), p. 255; W. F. Albright, "Syria, the Philistines, and Phoenicia," in *Cambridge Ancient History*, Vol II/2, p. 507ff

定的距离。关于埃及与海上民族之间的最后一次战役的发生地没有任何明确的文献记载，由此在文献学上形成了一个黑洞。然而拉美西斯三世的浮雕在不经意间暗示我们这次战役的战场应该在埃及三角洲沿岸。埃及法老获悉海上民族将至，并已经到达了埃及在亚洲设置的防御工事：“我把我的防线定在扎黑，那里驻扎着我的军队。我在尼罗河入海口设置军事防御工事，在那驻扎着我的海军，战船上从船头到船尾都布满了携带武器的勇敢的战士，而步兵也是从埃及各地挑选出来的最优秀的士兵。为了下达反击的命令，我亲自来到了扎黑。”关于扎黑准确的地理方位，我们不得而知，它的大体位置应该在巴勒斯坦南部沿海地区。

战役的结局绝不像拉美西斯三世所宣称的那样是埃及大获全胜，但埃及军队的确摧毁了海上各族组成的联盟并使其联盟成员四下逃窜。那些试图突破埃及三角洲地区防线的海上民族的战船也被击溃：“埃及军队与那些试图从海上进攻的海上民族在尼罗河入海口进行了激烈的战斗，最后这些入侵者被击溃在海边，埃及军队对他们进行了大肆屠杀。”海上民族中的一支晒克莱什逃到西西里，达阿努则在塞浦路斯定居下来，瓦绍什被打散。艾克外什（Ekwesh）和丹顿（Denen）分别与《伊利亚特》中的亚该亚人（Achaean）和达梅厄人（Danaean）有着密切的联系，路卡人很有可能源自于小亚的利西亚地区，舍登（Sherden）成为撒丁岛的原始居民，而派莱塞特就是《圣经》中的菲力斯丁人（巴勒斯坦由此而得名），柴克如也与以色列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结 语

海上民族的移民活动是公元前13世纪末12世纪初席卷几乎整个近东地区的一次武装移民，其中的动因表现在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客观上的原因不外乎这些民族对埃及以及其他国家财富的渴望，以及他们的故乡爱琴海诸岛饥荒与瘟疫的流行，这是来自爱琴海诸岛那些海上民族进行移民活动的原因；主观上的原因也是政治形势上的原因是海上民族的另一个组成部分，即来自小亚沿海诸城的那些民族在近东地区进行掠夺和移民的动因，这就是赫梯和阿黑亚瓦的衰落，使他们得以摆脱这两个强权的控制，进而自由地对富庶的国家和地区进行入侵和移民。

作为近东地区主要国家的埃及当然也就成了他们入侵、掠夺以及意欲定居的最佳目标。总括起来，海上民族对埃及的武装移民分为这么两个阶段，一个发生于埃及第十九王朝的国王拉美西斯二世（公元前1279—1213年）和美楞普塔（公元前1213—1203年）统治时期，这一阶段的海上民族对埃及的入侵主要停留在掠夺财物的层面上，还没有定居在埃及的企图；第二个阶段发生于埃及第二十王朝的国王拉美西斯三世统治时期（公元前1184—1153年），这个阶段的海上民族对埃及的入侵是十分典型的武装移民。与海上民族给近东其他国家和地区带来的灾难相比（如他们灭亡了曾经盛极一时的赫梯、乌伽里特以及塞浦路斯等国家），他们给埃及造成的灾害则是微乎其微的，究其原因就在于埃及辽阔的国土、千百年来的中央集权统治以及当时实力较强的军事力量。应当说海上民族的武装移民是成功的。此后近东地区出现的许多城市都是由他们建立的，而出现的一些新的民族则与他们或多或少地有着某种姻亲关系。

责任编辑：孙艳姝

K. A. Kitchen, *Rame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Notes and Comments*, Vol. V,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p. 40

K. A. Kitchen, *Rameside Inscriptions: Translated and Annotated, Notes and Comments*, Vol. V, Oxford: Blackwell Publishers, 1996, pp. 40 - 41.